

互联网与农业并非一“加”就灵

乔金亮



日前，农业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行动计划》、商务部等19部门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意见》……一系列关于“互联网+农业”的新闻颇为引人关注。各地闻风而动，积极跟进。

农业农村的确需要“互联网+”，消费者也对“互联网+农业”充满期待。目前，传统农业基本还是靠土吃饭，无论种植还是养殖，从生产到流通，总体上，既没有农业大数据的支持，也普遍缺乏农业物联网的支撑。而“互联网+”可以有效服务农业全产业链，互联网思维提供的解决方法和工具，让产销对接更加精准高效，也倒逼农业提高自身的标准化、规模

我国各地农情、粮情复杂，只有少数地方的某些领域能做到信息化应用，因此，不宜搞一刀切，不宜盲目“+互联网”。真正的“互联网+农业”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下的务实之举，是探索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紧密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最终实现政府“修路”、企业“跑车”、农民和消费者“取货”

化、组织化程度。

诚然，发展现代农业要有工业化理念，也要有互联网思维，但“互联网+”并不能包治百病，切不可为了电商而电商，急功近利盲目“+互联网”。农业毕竟不同于工业和信息产业，我国各地农情、粮情复杂，不宜搞一刀切。虽然不少地方实现了主要种植环节的机械化，但只有少数地方的某些领域能做到信息化应用。况且，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大多停留在试验示范阶段，农业信息技术的科研与生产脱节，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任务仍然艰巨。

“互联网+农业”发展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也要切实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责。当下的务实之举，是探索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紧密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最终实现政府“修路”、企业“跑车”、农民和消费者“取货”。

具体来说，在推进农业电子商务上，有关部门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只要对农民、农业有利，就要欢迎、支持。要充分调动运营商、服务商的积极性，让其有合理的利润，实现可持续运营。要通过政策举措，解决以前单个电商企业想办却办不好的事，解决农业电商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比如，农村物流配送等需要在县域范围内整体



不文明“黑名单”不应成稻草人

王 晋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一些不文明行为再次成为公众吐槽的“槽点”。今年以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了对不文明行为的惩戒力度。比如，国家旅游局实施了《关于游客不文明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档案公示；上海等地明确把探索建立“红黑榜制度”作为推进旅游诚信建设重要内容；故宫博物院将有乱写乱刻等伤害古建和文物的严重不文明行为的游客列入“黑名单”并禁止入宫等。

治理不文明行为，上述措施值得肯定，但更要做好落实的功课，莫要让不文明“黑名单”成为稻草人。

说到底，《旅游法》并没有对不文明旅游行为处罚作出规定，游客不文明记录的处罚仍缺少法律依据。只有修改《旅游法》，或者对《旅游法》作出进一步司法解释，才算是有法可依。同时，旅游部门没有执法权，只有旅游部门与有执法权的部门配合、联动，才能加强“不文明档案”的硬约束，让不文明游客产生“一时不文明，时时受约束；一处不文明，处处受阻碍”的震慑感。

好的制度需要好的执行。制度设计得再好，如果不严格执行，只会沦为一张空文。如果只出台管理办法，却鲜少有人执行；或者，即便有人执行，也因缺乏标准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间一长，小陋习就会变成大毛病，“黑名单”制度就会中看不中用。当前，不妨把“黑名单”制度与国家诚信体系建设相结合，建立公民个人信誉档案且全国联网，应涉及个人经营、生产、信贷、就业等管理审查，更要涉及出国出境审查。比如，某游客因有严重不文明案件记录，出境审查时可以被拒签，待限定期满后方可准签。

黄金周出现的不文明行为不应也不能年年都是问题。只有多措并举、各方共治，才能管住游客的“任性”。



聚焦人民币国际化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支撑

中国积极主动寻求变革,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以坚实的经济基础与良好的发展前景为人民币国际化背书,大大增强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与此同时,中国金融改革加速推进,在金融市场开放、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为构建高效、完善的现代金融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人民币国际化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田国立
中国银行董事长

未来人民币仍是强势货币

人民币报价机制的调整是对中间价与市场汇率偏离幅度的校正,对于引导市场预期、稳定市场汇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长期看,人民币仍是强势货币。汇率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属于决定性的基本因素。中国经常项目长期保持顺差,今年前7个月,作为经常项目主体的货物贸易顺差更是高达3052亿美元,这是决定外汇市场供求的最主要基本因素,也是支撑人民币汇率长期走强的重要基础。

肖玉强
中国工商银行美国区域管理委员会主席

人民币产品种类接近国际货币

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10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价值计算,8月份人民币首次超过日元,跻身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体系中所占市场份额达到2.79%,人民币国际化将是大势所趋。跨境人民币从贸易起步,而贸易和融资、投资相关,人民币正在更广泛的领域被使用,其产品种类和一些国际货币相比已经非常接近了。

李山泉
美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董事总经理

尽快培育相关交易市场

对人民币能否纳入SDR应该保持平常心。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健康平稳发展,人民币纳入SDR将是水到渠成的事。对中国政府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尽快培育和健全人民币相关交易市场,在产品创新、交易规则、市场监管等方面尽快与成熟市场接轨。

(以上观点摘编自新华社报道)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本版编辑 牛瑾 马洪超



推动南南合作迈向新高度

郭 言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由中国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南南合作圆桌会,总结了南南合作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新时期推进南南合作的倡议。中方的倡议为促进全球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必将推动南南合作迈向新高度。

中国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60多年来,中国把本国人民的利益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南南合作,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派遣60多万人次的援助人员支援发展中国家建设,为全球范围的南南合作树立了良好典范。在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中国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展示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国际社会一致认可。

中国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讲坛上的庄严宣示,铿锵有力,深得人心。中国一贯重视南南合作,正是在中方的积极倡导下,此次联合国南南合作圆桌会才得以成功召开。中方在会上提出的深化南南合作的建议,如探索多元发展道路、促进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实现务实发展成效、完善全球发展架构等,为推动南南合作走向更深层次指明了方向。

中国是南南合作的主要贡献者。据

联合国统计,当前南南合作框架下的贸易额约为5万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一半。而去年,中国对外贸易额超过4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相当比例的贸易和投资都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展的,为这些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改善了民生环境,减少了贫困人口。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未来5年为发展中国家在减贫、农业合作、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医疗设施、教育培训等方面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这些实实在在的南南合作举措,展现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奉献与担当。

中国是南南合作的活跃“造血”者。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合作中,中国不仅投入以鱼,更坚持授人以渔,通过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合作等方式,与各国分享发展经验和实用技术,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造血功能。近年来,中国与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带动以金砖国家合作为代表的南南合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还大力推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机制建设。同时,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为周边国家和全球发展提供新的公共产品,有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的整体造血功能,促进共同发展。

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伟大创举。站在全球发展的重要节点,中国愿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走出一条共赢的康庄大道。



徐 骏作(新华社发)

造假“一条龙”危害不小

国际一线奢侈品大牌,声称“境外代购正品”,附有境外商场售货单,本应数万元的同款商品仅卖三五千元,真的有这样的好事吗?日前,有媒体深入多地调查发现,尽管有关方面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假冒产品在一些地区依然猖獗甚至自成体系,发展成产、供、销“一条龙”链条。假冒“名牌”看上去“物美价廉”,实际上却是在严重挑战社会诚信的底线、破坏电商平台的发展环境,更挫伤着我国自主设计、自主研发的热情和能力。相关部门必须加大整治力度,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同时,更要为自主品牌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保护知识产权,让自主品牌产品成为市场上的紧俏货。

(时 锋)

从体制机制创新上寻找突破口

丛 屹



体制机制上的诸多不畅,阻碍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道路;偏向于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财政上的分灶吃饭等现实,也让三地相互封闭大于相互开放。为此,要进一步完善三地之间的执行协调机制;清理限制性政策,建立一揽子合作协议;积极探讨建立法律法规、政府交流合作等层面的保障机制;快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市场化程度

京津冀三地实现协同发展,本质上是打破藩篱、形成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而三地多年来的区隔和竞争,割裂了其内在经济联系,导致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从这个角度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所确定的三地发展定位,是从资源配置角度、整合协调三地发展需求的总体规划安排。

从现实需求看,北京需要控制规模、疏解功能;河北需要政策支持、淘汰落后产能;天津需要做强先进制造业基地、做大金融改革创新、发挥港口枢纽辐射带动作用。这与协同发展的总要求并不矛盾,只是,体制机制上仍然存在的诸多不畅阻碍了协同发展的道路;偏向于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财政上的分灶吃饭等现实,也让三地相互封闭大于相互开放。

因此,应该围绕《纲要》落实,从体制机制创新上寻找突破口。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三地之间的执行协调机制。目前,在中央牵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之下,不妨延伸形成网罗三地主要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按照三地行

政体制“中央+省、直辖市+地级市+区、县”的四级架构,执行层面应当勾连或影响到区、县一级,形成自上而下的决策影响力。

其次,要清理限制性政策,建立一揽子合作协议。尽快梳理现有政策体系,对与目标冲突、不协调的政策法规,尤其是一些限制性政策和排他性政策,进行研究、调整或清理,努力构建与协同发展目标吻合的政策法规体系。同时,三地也应共同制定若干重要领域的一揽子合作协议,拆除藩篱、打通市场,继续大力推进一系列“一体化”。比如,打破市场间行政区隔,统一政府审批和市场监管;围绕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资源合作开发与利用、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服务等,研究建立区域利益共享与利益分配、成本共担和成本补偿机制;改革财税体制,建立统一的税收分成机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创新投融资体制,建立金融一体化支持,共同发起建立京津冀发展基金;创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推进区域内社会政策一体化。

再次,要积极探讨建立法律法规、政府交流合作等层面的保障机制。建立区域内在规划、财政、发展、公共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确保三地协同发展有法可依、竞争冲突可协调;建立三地政府间的交流与互通机制;创新区域内官员考核制度,围绕协同发展的需要,落实过剩产能淘汰、生态环保、社会管理创新等与协同创新目标相一致的考核指标。

最后,要快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市场化程度。三地政府和相关部门仍习惯于依赖行政手段推动经济发展,市场主体也习惯于向政府要政策、要项目、要资金。计划体制的惯性还集中体现在行政审批项目多、权力集中,削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最活跃的民营经济没有足够的力量打破行政区划的空间限制、进行跨行政区域的行业集聚和整合,从而影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因此,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市场配置资源能力必须同时进行、相辅相成。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